

新河有个“蒙古村”

古城新河，历史悠久，人杰地灵。勤劳朴实的新河人民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，辛勤耕耘，以其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，描绘出了一幅风光无限、绚丽斑斓的锦绣画卷，铸就了一座顶天立地、光耀千古的不朽丰碑。然而，也许你想不到，在这个以汉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 99.9%的县域内还有一个“蒙古村”。

“蒙古村”在新河地图上名叫东董村，位于该县西流乡中部，全村人口 1050 人，300 多户，耕地面积 3300 亩，全村脱姓农户占 99%。他们虽然是汉族，但身体里却流淌着蒙古人的血液。他们是元朝名相脱脱的后裔，祖先是地地道道的蒙古族。几百年来，他们和这里的人民和睦共处、互敬互爱、取长补短，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新河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。

脱脱被害 后裔隐姓埋名到新河

翻开历史，我们这样认识脱脱，他是一位很有威望和道德修养的大臣。为朝廷，他大义灭亲，诛杀叛逆；为国家，他疏河道、兴水利造福人民，在元朝功勋卓著，无人可比。

史载，他幼小时养于伯父伯颜家，十五岁时便做了太子的辅佐官，不仅帮助皇太子避免灾难，还规劝皇太子怎样学习，熟练做太子的规则，保护善良、明辨是非等。他当御史大夫时，其伯父伯颜虽为中书右丞相，但专权恣横，为顺帝所忌。一次乘伯颜猎于柳林时，脱脱和顺帝密谋将其逐出京师。他大义灭亲的壮举受到了顺帝的赞举，很快便由史大夫升为中书右丞相。他上任后，复科举取士法，开马禁，减盐额，免旧欠赋税，号称“更化”。三年内，主修了辽、金、宋三史，并任都总裁官。为了解决国库的不足，他采纳吏部尚书契哲笃建议，变更钞法，铸至正通宝钱，印造交钞，令民间通用。后来黄河决堤，盐场被冲，百姓受灾，他亲自带领南北兵民十七万人，沿河筑堤，修复故道，被皇帝以功赐世袭答刺罕号。红巾军起义后，脱脱要求奉命出征，去讨伐已经占领徐州的起义军。班师回朝后，皇帝加封脱脱太师正丞相。张士诚起义后，脱脱又都统诸王爷军马，董都大小官员将领，前去剿灭。在高邮连打了几次胜仗，大权在握，皇帝怕脱脱权力过重，以“老师费财”为名，就军中削其官爵，元军大乱，被张士诚义军击败。第二年，脱脱流徙云南，被毒死。他的三个儿子为了预防被害，便逃到新河，又从新河分手，三公子隐姓埋名为周彬，在这里繁衍生息，才有了现在的东董村。太平后，后人又恢复脱姓，除东董村外，与之相邻的还有西董村，两村原本是一个村，名董村。建国前分为两村，居东的叫东董村，居西的叫西董村。居西董村的百姓中有 30%为脱姓，他们同样也是脱脱的后裔，只不过人数少了些。

脱氏墓地 神秘面纱难解开

在农村，很难看到有这样的墓址了。墓区 15 亩的面积全部被青松所覆盖，幽静庄重，密植年久。村支部书记脱志君告诉记者，以前这里 500 年以上的松树还有许多，只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红卫兵砍了，如今只剩下这些了。

脱氏墓南高北低，据二世祖周彬墓碑文记载：明天启六年，九世恩赐寿官脱格等率族人一修墓地：立石碑，开神道，植树株，禁戕伐，以杜侵占之害，并立下“子孙贤，则扩之，否则亦严守之”的千古明训。

走进墓区，绿草掩盖的脱周彬墓看上去更像一个蒙古包，它椭圆凸凸，在它的周围诡秘地躺着一些残缺的石碑、石龟、石座等，都极具考古价值。村里脱仲元老人说，上世纪80年代，东董村成立了脱氏墓管理协会，整理散于村内的文物，现征集到：元太师脱脱丞相故里碑一块，明代脱镐墓碑一块（明万历三年碑）；牌坊石6块，龙碑一块，双龙戏珠碑帽一块，石狮子一只，刻有脱脱丞相家祠的木刻一方，家谱一部等，未破坏的古墓4——6座等。还需要说的是，原先墓区石马、石人、石羊很多，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鬼子要村里的百姓把它砸碎，砸成石子来修公路，为了把这些文物保存下来，一夜之间，脱氏后裔便把它推倒，挖深坑埋了起来，这些文物如今还静静地躺在地下。

老人还说，因为是蒙古族，在入葬形式和墓室构造上很可能与汉族有所不同，比如水文、地貌、葬深、葬浅、随葬品多少等。有的墓在文革中被毁，有的还未被毁，里面肯定会有一些有价值的文物。1963年发大水时，有的墓可能冲坏，有一个村民发现水上飘着一个物件，游过去拿起来一看，原来是一个瓷器，像个大元宝，但瓷器又怎么能飘起来呢？他始终也弄不明白这个理，等到他以50元的价格卖掉后才知道，从墓地冲出来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“瓷器”，它内空外坚，是古人埋葬时的“元宝枕头”，是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。古有“千墓一枕”之说，意思是说，在1000个古墓中，才有一个这样的“枕头”。除了“元宝枕头”，还有“万年灯”，文革中个别墓被毁，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在墓中发现了“万年灯”，这个灯看着像水缸，但壁周是空的，里面可加入许多麻油，能燃烧半年。除了这些，壁的四周还铸着各种图案，只可惜不知道现在流失在什么地方了。

古风遗续，蒙汉都是一家人

周彬避难隐于董村之后，虽然名字改了，但蒙古人明显的特征却无法改变，好在勤劳好客的汉族人民并不看重这些。到乡随乡，不算外乡，周彬很快便在当地学会了使用耩、犁、耨、耙，学会了用瓮缸囤粮，很快便与这里汉族百姓打成了一片，生活方式如今基本上汉化，习俗只有葬礼不同。

“祖领孙葬倒下穴”葬法是最明显的特征，即：以南为前、北为后，自莹地南部开始，依照辈分依次排列向后（北）葬法，俗说：“爷爷在前，领着子孙们向前走”，此与其周围村以北为上，次第葬埋者正好相反。再者新建宅院，有于院墙外侧，嵌以砖刻：“太公在此”四字，不同于通常汉俗，每建宅，多在主梁上书写红帖：“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”数字，两者所书地方字数有差，其含意亦相径庭，颇耐寻味。

生活方式完全改变了以食肉为主的生活习惯，一日三餐，以粮食为主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村里虽然仍以农业为主，没有商品生产，但他们诚实、热情、勤劳、勇敢、聪慧，其社会组织单位仍以大家庭者居多，祖孙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妯娌同处，长者主家，治家严谨，尊老爱幼、妯娌和睦、夫妇相敬，风尚勤俭，耻于奢懒，村内少有酗酒、赌博、斗殴等恶习，也绝无算命、相面等愚昧活动。他们尊重知识，崇尚文化。村内有一户教育世家，德高望重素为世人所尊重，村民引以为荣，他就是脱文英老师一家，从他祖父、父亲至今三代在当地执教近一个世纪，新河县人民政府曾为其家赠匾为：桃李满天下。

可歌可泣 革命传统育后人

脱家人在该县历史上被称道为“文学相续，世为善族，不乏闻人”，为全县人所推崇，书之志伟。在近代人民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里，特别是有了共产党的领导，脱家人更是同县内外各族人民团结一道，风雨同舟，患难与共，勇于牺牲，其中涌现出的杰出人物，更是前仆后继，其业迹威武雄壮，可歌可泣。

该村早在抗日战争前后，即有了地下党的活动，1938年建立了党的基层支部，从而成了党的坚强基层堡垒，对敌展开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。在那腥风血雨的战争岁月里，日伪在西董村和公路旁分别建立了岗楼，两座岗楼距东董村只有二百余米，敌人居高临下，严密封锁。而机智、勇敢的东董村人，在国家、民族生死存亡关头，不畏强暴，在敌人的枪口之下，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，家家成了地下党的安全堡垒，并且送出自己最优秀儿女参军参战，流血牺牲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，至今人们口碑相传，引为骄傲。

在日寇铁蹄下，该村却经常驻有抗日二区和四区两个区委会进行活动，当时四区政委脱立学同志，化名郭民生，是本村人，常来活动，岗楼上的日伪军闻讯，立即进村挨户搜查，而总是落空。他在本村英勇地进行抗日宣传，组织抗日军民破路、破线，扩军参战，筹粮支前，搞得敌人气急败坏，决心捕获他，后来他在小屯村终遭被捕。组织上为营救他，组织动员了全县武装力量，不惜重大牺牲，截击日伪军，硬是从敌人刺刀下把他救回来。

新中国解放后，代表脱姓的年轻一代，继续发扬老一辈的光荣传统，用宝贵的生命捍卫着伟大祖国。他们积极报名参军，抗美援朝、对越自卫反击战都留下了他们的鲜血，为脱氏写就了光彩的一笔。